

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批判古代住宅建筑设计中的儒家思想

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建筑学专业理论小组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触及到各个学科领域,通过批判,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儒家反动思想在居住建筑设计中的反映,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改造建筑学科是有很大好处的。

建筑这门学科,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就为哪个阶级服务。住宅和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它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形成的一定的生活方式的特征。原始社会中,简单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洞穴、窝棚;封建社会中,在家长制的基础上产生四合院式的住宅建筑;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了满足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生活的花园洋房以及为取得利润而造的出租房屋,而劳动人民只能住窄小阴湿的住宅。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大量建造满足劳动人民生活需要的职工住宅。

代表中国最腐朽、最落后势力的儒家反动思想统治我国达二千多年,其恶劣影响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也同样深刻影响到我国居住建筑的设计。毛主席指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在这漫长的三千年中,居住建筑的变化发展不大,就是由于在儒家反动思想统治下形成的我国封建社会的保守性、落后性束缚了住宅发展。

恩格斯说:“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是一种经济单位。”按照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观念,并为满足封建家长制而产生的四合院式的住宅,长期以来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手段的一部分。

儒家崇尚周礼,孔老二曾叫嚷“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明确规定了奴隶制的氏族宗法关系,竭力维持奴隶主家庭的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即所谓“亲亲”;同时又在奴隶主贵族中规定了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和各种礼法,不准超越,即所谓“尊尊”。这种“亲亲”、“尊尊”的奴隶制等级观念后来被儒家反动思想家董仲舒等加以改造和发挥,发展成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三纲五常”等一整套反动思想。在这种反动思想下,君臣父子不得僭越,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主子和奴仆更是界限森严。这种反动思想对居住建筑设计的影响很深。官僚、地主家庭的四合院式建筑,常常是四世五世聚族而居,形成封闭独立的住宅建筑群。在建筑平面布局上强调轴线,家长住正房,其位居中,开间大,进深深,顶棚高。明间、次间、稍间也是主次分明,大小不同。儿孙辈住厢房,左右辅从,仆役住前院,以垂花门与内院相隔,以别尊卑。而且,在住宅建设中有严格的等级限制,“自天子以至庶人,各有室制”。到了明代,随着孔孟之道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住宅建筑中更出现了一整套的法制,如“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不许造九五间数”,在房屋的建筑装

饰中也同样是反映了“贵贱有等，贫富轻重有称”的等级思想。总之，儒家反动的宗法和等级观念严格地制约了住宅建筑，反过来，由此产生的地主贵族四合院式的住宅建筑又为维护封建氏族制度和整个封建等级制度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有这样一段描述，林黛玉到了“荣国府”，因为是女流晚辈，所以“三间大门却不进正门，只由西角门而进”。就是在仆役中也是等级分明。林黛玉进门后则要换上一批轿夫。轿至垂花门，轿夫们“俱肃然退出”，众婆子上前打起轿帘扶黛玉下了轿，经穿堂，进大院，方登正房。“荣国府”的建筑则完全是为这种陈腐的封建礼仪服务的。我们从地主庄园——“衍圣公府”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它除拥有由一个个四合院组合而成的大批房舍满足孔老二的子孙的寄生生活以外，另外还设有公堂，什么大堂、二堂、三堂，据“孔府档案”的一些记载来看，凡孔氏族人以及孔府佃户、庙户、仆役等犯了“法”，“衍圣公府”可以自行传讯或断结。另外还设有什么“厅”、“衙门”，从建筑设计上也反映出它是一个拥有种种司法特权的、剥削压迫农民的“小朝廷”。

儒家推崇殷周以来有神论的天道观，宣扬“天命论”，敬天祀祖，抬高上帝和鬼神的地位，儒家还用占卜、巫祝等一套迷信手法来欺骗劳动人民，维护反动统治。孔老是提倡占卜的祖师爷之一，说什么“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把凤凰和八卦图作为天下太平的先兆。在儒家这种反动思想的控制、影响下，在住宅设计中也带上了不少封建迷信的色彩，如造房子要讲什么“风水”，在住宅布局中，一定要根据“八卦”中方位的规定，搞什么“坎宅巽门”，就是宅基要朝南，门要布置在正房的东南角，这才符合“紫气东来”，才能吉利，子孙才会发达。这就造成许多宅门偏向一侧，或是直墙斜门，既浪费了空间，又给建筑带来了很多麻烦。而且在住宅建筑中必须设有祭祖祭神用的祠堂及其他附属的宗教迷信建筑，造成很大浪费。

在我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推崇者都是一些“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的剥削者、寄生虫。他们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信条出发，鄙视耕战，厌恶生产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他们不劳而获，养尊处优，过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奢侈生活。因此在历代官僚、地主家庭的住宅建筑中，都是重重高墙围割，幽深曲折，把整个家属及子女禁锢其中，与外界隔绝开来，与生产劳动和广大劳动人民隔离起来。在这一个个的封建小王国里，封建官僚地主教子“尊孔读经”，“学而优则仕”，从小就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培养他们成为反动阶级的接班人。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儒家反动思想被越抬越高，这种住宅建筑对外的封闭性和其内部的繁复性越来越厉害。我们从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地主、富商的住宅还是用墙来封闭搞成廊院式的住宅，到了唐代就有带厢房的三合院、四合院了。到了明、清以后，住宅四周都有屋墙封闭，对外不开一扇窗户，前院大门内有影壁，更起一层封闭作用，内部有前院、后院、客厅、正房、厢房、耳房、杂院等等。现在还可看到的四川的大地主庄园和苏州的一些官僚地主住宅，无不是这种四合院式房屋组合而成。在四周不透风的高墙之内，前后左右，院子达几十个，有门厅、轿厅、大厅、花厅、后厅等，有读书的书斋，有看戏的戏楼，有游憩的后院，有专供仆役、女眷走的避弄，专作祭祀用的祠堂等等。这种浪费大量地皮、建筑材料而又阻碍生产劳动的住宅建筑就是儒家“本荒而用侈”的路线对住宅建筑的深刻影响。

当然，作为一种物质的建筑形式，四合院也能满足人们的一定的生活需要，劳动人民的住宅建筑有些也采用了这样的形式，但他们在建筑的指导思想和内容上与地主、官僚们的住宅有根本的不同。劳动人民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家庭成员大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因此就不会去搞那种地主、官僚们的封闭式的四合院大组合的住宅，房屋建造要适应劳动生产和简朴生活的要求，在平面布局上常常是只有几个房间，如中间作日常起居和进行家庭手工业的堂屋，两

边是厨房和杂屋等。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北方地区,为了防风沙,争取户外活动的场地以及安全的考虑,也有在房屋四周垒起院墙,靠墙搭一些棚屋,但形式简单,不去搞什么主轴线,什么主卑关系,房舍上男尊女卑的思想也不那么突出。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我国历次农民起义,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指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例如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方腊提出“法平等,无有高下”,到了太平天国,更提出了“人人无贵贱”的鲜明的革命口号。农民起义猛烈地冲击了封建贵族地主的宗法制度,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封闭式的封建住宅建筑形式。明朝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军,攻占曲阜后就在孔庙驻军,在这个“圣地”“秣马于庭,污书于池”。太平天国军占领南京、苏州等城市后,将那些大官僚地主的住宅改作办公、议事场所,把许多地主住宅分给贫苦劳动人民居住,这在当时是有重大革命意义的反潮流行动。

解放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蒸蒸日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家庭中,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完全改变了。我们也不要那种维护封建统治的大家庭式的住宅群。党和国家为迅速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劳动人民流离失所、“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情况,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大批住宅。如首都北京到1970年止,新建的住宅为解放前原有住宅面积的1.5倍;上海市新建了工人新村130多个,新建住宅解决了一百多万劳动人民的居住问题。一些新型的工业城市,如合肥市新建住宅达原有住宅的七倍左右;古老的苏州市,有计划地新建了58万平方米的住宅,形成了一个个新的工人住宅区。这些新型的住宅在形式上和那种封闭式的四合院根本不同,它的平面布局都是有一到几间的卧室(兼起居室)和一些独用或几家合用的辅助房间,组成一个单元,再由这些单元组合成整幢的住宅房屋,主要为人口不多的家庭使用。在具体设计中,各地区、各单位根据不同的条件和情况,搞了各种各样类型的居住建筑,但都明显地反映出新的社会、新的家庭关系和同志式的邻里关系,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这些真正为劳动人民所需要的居住建筑,只有今天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

但是,居住建筑设计中儒家思想的影响至今还存在着,有的设计人员无视社会已经改变,家庭组合已起了变化的客观实际,硬要拿这种旧的形式去套,他们一味沉浸于四合院的所谓“安静”、“舒适”,“最少外界干扰”,“最能闲情逸志”,甚至说:“要为住户创造一个小天地”。有的人认为四合院是我国特有的民族形式,应当全盘继承。他们不去分析这种或那种形式,是怎样产生的,是怎样为政治服务的,一味照套照搬。如建国初期,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时,请来帮助建设的一批外国专家,看到了四合院的住宅,就不问实情,在一些城市的职工住宅和居住区中,硬是套用了这种形式,造成了用地浪费,公用设施、管线浪费,居民使用也不便利,有许多朝向不好的房间,成为城市建设中的赘瘤。任何建筑形式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条件,它必然反映一定的政治内容,并和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和意识形态相关。只有从阶级、路线上去分析研究,才能分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才能做到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断创造出符合我们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需要的新的建筑形式。